

2005年《纽约时报》十大好书

TONY JUDT

PO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战后欧洲史 [下]

[美] 托尼·朱特 著

林骥华 唐敏 等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HISTORY COMPANY PRESENTS

THE HISTORY COMPANY

PO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战后欧洲史

THE HISTORY COMPANY
1995 1996 1997



THE HISTORY COMPANY PRESENTS

TONY JUDT

PO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战后欧洲史

[下]

[美] 托尼·朱特 著

林骥华 唐敏 等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欧洲史. 下 / (美)朱特著;林骧华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225-661-3

I.战... II.①朱...②林... III.欧洲—现代史

IV.K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2381 号

Postwar by Tony Judt

Copyright © 2005 Tony Jud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战后欧洲史(下)

[美]托尼·朱特 / 著 林骧华 / 译

责任编辑:吕林

装帧设计:林涛 秦崑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6.625 字数:939千字

版次:2010年1月第一版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5-661-3

定价:88.00元(上、下册)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译者

- | | |
|---------|--------------------------------|
| 林骧华 | (前言与鸣谢, 导言, 索引, 第 1—3 章, 全书统校) |
| 唐 敏 | (第 4—10 章, 第 12—13 章) |
| 梁 薇 | (第 11 章) |
| 司建国 | (第 14 章) |
| 胡 荣 | (第 15 章) |
| 张守柱 | (第 16 章) |
| 孙钦美、陈先奎 | (第 17 章) |
| 张 欧 | (第 18 章) |
| 杨万斌 | (第 19 章) |
| 冯智强、陈敬岩 | (第 20 章) |
| 薛初晴 | (第 21 章) |
| 张小丽 | (第 22 章) |
| 张忠魁 | (第 23 章) |
| 庄彩云 | (第 24 章) |
| 宋 柯 | (跋) |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欧洲的惩罚政治》(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著)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 20 世纪》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大幻想? ——欧洲论稿》

《并非完美的往日:1944—1956 法国知识分子》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 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1939—1948 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主编)

《1871—1914 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1921—1926 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第 14 章

降低期望

第三部分

衰退时期：1971—1989

第 14 章

降低期望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难题。 453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1971年

杀人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有的时候它是必要的。

——杰瑞·亚当斯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
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毛泽东

这是铅一般沉重的时刻——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

——艾米丽·狄更森

朋克可能是为文化理论家们发明的——事实的确部分如此。

——罗伯特·海威森。

即使在 60 年代的喧嚣平静下来以前，造就这份喧嚣的独特环境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有史以来最昌盛的 10 年的最后 3 年里，战后的经济繁荣热潮结束了。西欧的“辉煌三十年”被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所替代，同时还伴随着大范围的工人失业

和社会不满。60年代的大部分激进分子,如同他们的追随者一样,放弃了“革命”,转而为自己的工作前景担忧。一些人选择用暴力对抗的方式;它们造成的损害和由这些行为导致的政府应对措施,引发了一些恐慌言论,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失控”。这种恐慌感被证明是夸大的:西欧各国政府顶住了压力,显示出了超出旁观者想象的应变力。但是不可能再幻想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乐观主义时期了。

当两种外部打击使西欧经济几近停滞时,经济滑坡的影响才刚刚开始。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国废除固定汇率制度。自从布雷顿森林公约签订以来一直是国际货币比价标准的美元,从此以后将随着其他货币的汇率浮动。而促成这一决定的背景是美国因参与越南战争而背上的沉重军事负担,以及不断增长的美国联邦财政预算赤字。与美元挂钩的是金本位制,华盛顿政府越来越担心国外的美元持有者(包括欧洲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从而消耗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1〕

美元自由浮动的决策从经济方面来看是理性的。经历了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昂贵的拉锯战——为此付出了举借外债的代价——美国已经不可能期望继续维持固定而又不被高估的汇率。但是美国的这一举措无疑是一枚炸弹。如果美元的汇率出现浮动,必将导致欧洲货币的汇率浮动,那么战后精心构建的货币和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就会出现问題。固定汇率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政府希望它能够控制国家的经济网络,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什么呢?

随着之后几个月的混乱、两次接踵而来的美元贬值,以及1972年英国的英镑“浮动”(推迟带来了英国银本位制度这个古老而又不堪重负的角色),1973年3月,欧洲各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浮动汇率制。显而易见,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会是通货膨胀。由于1971年8月美国采取美元汇率自由浮动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元贬值),欧洲政府不得不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允许放宽信贷、放任国内物价上涨和国内货币贬值,以遏制必定出现的经济滑坡。

在通常情况下,这个受控制的“符合凯恩斯理论的”通货膨胀会是成功的——除了在西德,因为自古以来德国人对物价上涨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与排斥。但是美国退出固定汇率制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刺激了货币投机,而国际浮动汇率协定对此是无限制的。这又破坏了各国政府为操纵本国利率和维持本国货币价值所做的努力。货币贬值了。随着货币的贬值,进口货物的成本相应增加:1971年到1973年期间,世界非燃料商品价格上涨了70%,食品价格上涨了100%。就是在这种已经很很不稳定的状况下,国际经济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1〕 美国联邦财政预算赤字由1965年的16亿美元上升到1968年的252亿美元。

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人日历上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进攻,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主要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在24小时内宣布削减石油开采量;因不满美国对以色列的庇护,10天后又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同时将石油价格提高70%。中东战争于10月25日以埃及和叙利亚的停火而告终,但是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的不满并没有随之消除。12月23日,阿拉伯产油国联合起来再次提高油价,使其上升到1973年初的两倍多。

为了了解这些变故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回顾一下石油价格的变化尤其重要。与其他几乎所有现代工业经济依靠的初级商品不同,石油价格在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当中几乎保持不变。一桶沙特阿拉伯的轻原油在1955年的价格是1.93英镑,到1972年1月上涨到2.18英镑。去除那些年的货币通货膨胀因素,油价实际上是下降的。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并不限制其成员国将石油储备当作政治武器。西方国家早已习惯了依赖这一充足而又廉价的石油产品——它同时又是保持社会长期繁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石油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不断稳步增加。1950年,西欧能源消耗总量中的83%是固体燃料(绝大部分是煤和焦炭),只有8.5%是石油。到1970年,使用固体燃料和石油的比例分别是29%和60%。1973年,意大利能源需求的75%依赖进口石油;而葡萄牙则达到80%。^[2]英国曾因在北海发现了油田而一度自给自足,但它的石油开采也只是于1971年才开始。50年代末至60年代,西欧出现了消费热潮,上百万辆新的汽车开上马路,它们的动力供应既不能依靠煤、也不能依靠电,尽管那时——特别是在法国——已经可以使用核能发电,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大陆对廉价石油的需求和依赖。

至此,进口燃料的价格是以美元的固定汇率来定价的。因此,变化浮动的汇率和石油价格上涨变成空前的不稳定因素。在此之前的20年时间里,物价和工资的上涨是稳定而温和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仍然可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现在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非欧共体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1961年到1969年期间稳定在3.1%,1969年到1973年期间是6.4%,1973年到1979年期间年均通货膨胀率是11.9%。这只是整体数据,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稍有不同:从1973年到1979年,西德的通货膨胀率仅为4.7%,而瑞典是西德的两倍。法国在那些年当中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0.7%,意大利是16.1%,而西班牙则超过了18%。英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5.6%,但是在最糟糕的年份(1975年)却超过了24%。

此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在历史上并不是空前的,但是这对于经历过50年代和60年代

[2] 相比之下,美国的石油进口在1973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占到国内消费总额的36%。

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的人民来说,的确是新的体验——对他们的国家也是如此。更为糟糕的是,70年代的通货膨胀——伴随着1979年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伊朗革命推翻了国王统治,造成了石油市场的恐慌,石油价格从1979年12月到1980年5月上涨了150%——使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辛而痛苦的生活。在过去,通货膨胀与增长相关联,通常是由于增长过快。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都伴随着通货紧缩:由于过于刚性的货币以及政府和人民长期的消费能力不够,导致物价和工资的下降。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人们在传统的模式中似乎找不到解释现实的答案。

相反,西欧国家开始经历所谓的“不景气状况下之物价上涨”:在出现经济滑坡的同时工资和物价出现膨胀。现在来回顾这种情况,不会像当时那样令人惊奇。到1970年,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工业生产行业的移民潮已经结束;不再能吸收到“闲散人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下降了。100%就业仍然是欧洲主要工业和服务行业的标准——到1971年,英国的失业率只有3.6%,法国只有2.6%:但是这意味着有组织的、习惯于以优势地位和雇主们讨价还价的工人们现在面对的是雇主们的利润率开始缩水。

自从1971年以来,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工人代表们要求提高工资并获得其他经济方面的补偿。即便在1973年经济危机之前,也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开始走向衰退。实际的工资增长已经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利润不断下降;不再有新的投资。战后经济复苏激发的投资热情一点点被通货膨胀或者失业所吞噬。由于中东危机,欧洲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两个问题同时并存。

对比过去的经济繁荣,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更显得糟糕。参照历史标准进行比较,该时期西欧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不是特别低,处于英国的1.5%和挪威的4.9%之间,实际上比法国、德国和英国在1913年到1950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1.3%有明显的提高。但是与不久前的过去相比,差别却很明显:从1950年到1970年,法国的年均增长率是5%,西德将近6%,即使是英国也维持了超过3%的年均增长率。20世纪70年代同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3〕

然而,痛苦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随着针对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出口竞争压力不断加剧、进口商品(不仅仅是石油)的价格不断提高,更是雪上加霜。失业率开始稳步而无情地上升。到70年代末期,法国的失业率占全部劳动力的7%;意大利为8%;英国为9%。有些国家——比利时、丹麦——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失业率与30年代相似;法国和意大利

〔3〕 平均值毕竟只是平均值。在最低迷的1976年,英国的失业人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超过100万,而且年均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5%,各国的增长率都降到了低点——意大利的国民经济出现战后的首次负增长。

利的失业问题更严重。

经济衰退的一个即时后果就是对各种“外国”工人的冷遇。虽然对产成品的需求锐减,但是官方公布的西德失业率(在1970年接近为零)却没有达到8%,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失业的工人并不是德国人——因此不被官方统计在内。例如,当奥迪公司和宝马公司在1974年和1975年大裁员时,首先被解雇的便是“外来工人”;失业的宝马公司员工中五分之四的人都不是德国公民。1975年,联邦政府永久性关闭在北非、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征募劳工办事处。联邦委员会在1977年的一份报告中的“基本条款第1条”中指出:“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只是那些最终还会自愿回到自己国家的外国人的居住地”。6年后,联邦议会通过法案来“帮助外来工人做回国准备”。

很多外来工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确回到了自己的国家。1975年,29万名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离开了德国,去了土耳其、南斯拉夫、希腊和意大利。同年,20万西班牙人回国找工作;而意大利的移入国内者人数首次超过移居外国者人数,很快在希腊和葡萄牙也出现这种情况。70年代中期,将近30多万移居外国的南斯拉夫人不得不回到巴尔干半岛,但是那里的就业状况并不比在德国或者法国乐观。北欧的就业危机转嫁到了地中海地区。同时,法国严格限制阿尔及利亚以及它以前的非洲殖民地国家人民入境,英国也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排斥南亚次大陆的有移民倾向的人。

结构性失业、奇高的石油进口价格、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下降的出口,导致了席卷西欧的财政赤字和支付危机。即便作为欧洲大陆制造业和出口业领头羊的西德,也没能幸免。458
在1973年一年之内,它的贸易支付由94.8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变成了6.92亿的贸易逆差。英国国家财政连续出现赤字——到1976年12月,开始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以致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面为其作担保。其他国家也好不了多少。1974年,法国的财政收支出现逆差,而且此种状况持续了近10年。意大利和英国一样,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对于英国出现的这种状况,它的领导人将之归咎于“国际力量”实施的不受欢迎的国内政策。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预算不足和支付赤字——如同通货膨胀本身——并不是生来有害的。在30年代,它代表了“用自己的办法”摆脱经济不景气的一种似非而是的办法。但是在70年代,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已经被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压得不堪重负。正如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所言:“我们曾经认为自己可以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我坦率地告诉你,现在这种可能已不复存在。”他们也不能指望通过放松贸易政策来解救自己,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做过的那样:60年代中期最近一轮的“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已经将工业税率调到了历史低点。如果再采取什么措施的话,必将面临不断增加的国内反对竞争保护的壓力。

20世纪70年代的决策者们面临的选择具有更加复杂的因素。环境和时局引发的经济危机与政府的软弱改良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西欧进行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几年前曾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浓烟工业的重要性正逐渐下降。钢铁工人、矿工、汽车制造工人和纺织厂工人都开始失业了,这不仅是因为周期性的经济低迷,或者是石油危机的附带后果。这是因为古老的西欧制造业经济正在消失。

459 证据是无可争议的,尽管多年来决策者们一直试图忽视这些迹象。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的采煤业达到最高产量以后,煤矿工人的人数一直稳定下降:在比利时南部桑布尔-默兹山谷矿区,1955年的煤炭开采量为2050万吨,1968年下降到只有600万吨,而10年之后的开采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1955年到1985年期间,比利时有10万名矿工失业;与采矿业相关的各种相关贸易也相应受到影响。英国的采矿业损失更大,经历的时间也 longer。在1947年,英国自称拥有958个煤矿;然而45年之后就只剩下50个了。采矿业工人的人数从71.8万下降到4.3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流失在1975年到1985年的这10年期间。

作为欧洲工业另一主要行业的钢铁行业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因为钢铁不像煤炭那么容易被其他产品替代,所以对它的需求量并没有大幅度下降,但是随着更多的非欧洲国家进入工业生产的行列,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钢铁的价格不断下降,因而生产成本较高的欧洲钢铁产品市场受到冲击较大。从1974年到1986年期间,英国有16.6万名钢铁工人失业(尽管在1986年,英国的主要钢铁生产商——英国钢铁公司取得了近10年来的首次盈利)。造船业、汽车业和纺织业都因为类似的原因受到影响。在英国纺织品和化工行业都屈指可数的考陶尔兹公司在1977年到1983年期间裁员50%。

7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几乎所有传统行业的失业率骤增。在1973年之前,煤炭、钢铁等行业开始进行改革;之后扩展到化工、纺织、造纸和消费品行业。欧洲所有国家都元气大伤:1973年到1981年期间,在小工程公司和汽车制造企业集聚的英国西部内陆,有四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在法国西北部的洛林工业区,有28%的制造业工人失业。同年西德纽伦堡的产业工人失业率更高达42%。意大利都灵的非亚特汽车公司自从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换为自动化生产后,3年之内工作岗位减少了6.5万个(总共的工作岗位是16.5万个)。20世纪5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产业工人人数占工人总数的40%,但是25年之后,这个比例下降到七分之一。

在过去,规模如此庞大、速度如此之快的经济转变必将导致极大的社会创伤以及不可预料的政治后果。好在有政府的福利政策——也许还包括当时人民低迷的政治热情——没有太多的示威抗议、也没有激起太大的民怨。但这并非说它们是不存在的。1969年到1975年期间,西欧的产业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静坐、罢工和向政府请愿等活动,活动遍

及西班牙(1973年到1975年西班牙产业工人的罢工达到159万个工作日)和英国,英国煤矿工人举行了两次大罢工——分别在1972年和1974年——迫使紧张的保守党政府推迟几年关闭主要煤矿,甚至同意给所有工人都提高津贴。

采矿工人和钢铁工人也许是当时最著名和最绝望的有组织的抗议者,但他们并不是最具有斗争精神的。传统行业的工人人数不断下降,抗议力量由工会运动转向服务行业联盟组织的运动,而且活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在意大利,随着共产党领导的传统行业的成员不断减少,教师和公务员组织的规模和战斗力量不断增强。老的联盟对工人失业缺乏足够的同情心;绝大部分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和他们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尽可能避免公开的冲突。好斗的协会组织——法国的“工人力量”(FORCE OUVRIERE),英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全国协会”、“全国公务员联合会”和“科技与管理人員协会”——斗志昂扬地继承了青年人和失业者的事业。

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对就业和工资保障的强烈要求,欧洲领导人最初参照过去的经验。他们与英国和法国强势的工会代表们协商通货膨胀中工资的解决办法。在意大利,工资和物价与按照标定指数系统的相同比率挂钩,称之为工资指数等级系统,自1975年开始实施。不景气的行业——特别是钢铁行业——由国家接管,与战后首轮国有化的做法类似:在英国,通过1977年制定的“钢铁计划”,统一规定钢铁价格,取消了价格竞争,挽救了整个行业;在法国,洛林地区破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和国家的工业中心重新组合成为由政府给与保障的国有联合公司。在西德,联邦政府也参考类似形式,鼓励私人企业合并而不是国家控股,同样也达到了企业联盟的目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鲁尔煤矿控股公司的产煤量占到鲁尔地区产煤总量的95%。

通过直接的工资补贴(支付一定金额给雇主,使其不解雇富余的工人)以保留工人的工作岗位,以及制定限制第三世界国家产品输入本国的保护措施,法国和英国的国内纺织行业得以存活下来了。在联邦德国,波恩政府采取措施,工人们实行半日工作制,减少了80%的工资成本。瑞典政府则直接资助虽不赢利但是政治敏感性高的造船业。

各国对付经济萧条的对策各不相同。法国政府采取了微观经济干预措施,确定各行业的“国家龙头企业”,给与它们合同、资金和信用担保方面的支持;英国财政部继续宏观经济调控的老传统,采取调整税收、利率和再补贴等方面的措施。令人惊奇的是政策方面的变化很少。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意大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派成员、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和英国的各党派政治家们起初本能地听取了战后多数人的呼吁:尽可能消除失业、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为失业人员转换工作岗位,为不景气的私营和国有企业提供现金补贴等等。

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确信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程度已经大

461 于大规模的失业问题。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只有通过对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定一些国际协定,以代替美国政府抛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2年,欧共体原六国开始构筑“蛇洞浮动汇率制”,规定缩小欧共体成员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只允许波动1.125%,总波幅为2.25%。这个波动幅度比欧共体以外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少一半。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首先加入“蛇洞浮动汇率制”,但是仅仅维持了两年时间,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政府由于无力或者不愿顶住国内货币贬值的压力,都被迫宣布退出“蛇洞浮动汇率制”,让他们的货币自由浮动。法国也曾经两度加入和退出“蛇洞浮动汇率制”。很明显,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当时的状况。

1978年,西德总理施密特呼吁建立一种更严格的制度以取代“蛇洞汇率制”,这就是“欧洲货币体系”(EMS)。每一成员国的货币都以欧洲货币单位(ECU)〔4〕定出一个固定汇率,共同对美元浮动。由于马克既是欧洲货币体系中最强的货币,又是国际外汇市场上最主要的交易货币之一,人们便常常把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货币与马克汇率的波动,作为中央银行干预的标志。成员国要致力于控制国内经济以维持其在欧洲货币体系的位置。这是德国首次在金融方面掌握主动权,事实上,德国马克至少在欧洲已经取代了美元。

有些国家没有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特别是英国,因为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正确地认识到,欧洲货币体系将阻碍英国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以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而加入的国家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加入。作为“必须的解决办法”,欧洲货币体系行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或者是欧盟委员会和几年之后的欧元的职能):它可能迫使政府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政府可把这归罪于外国人制定的条款和规矩。事实上,这是新安排的真正长远意义所在。他们在及时消除通货膨胀问题上并不是很成功(尽管也做了一些),但是却成功地剥夺了各国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上的主动权。

462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它所带来的影响在当时也许还不能完全看到。在过去,如果一个国家选择“硬钱”策略,坚守金本位制或者不愿意降低利率,那么它必须对它的选民们有所交代。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状况是,无论是英国政府、瑞典政府还是意大利政府,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失业问题,或者持续下降的工业产值问题,或者通货膨胀导致的工资增长,它们都只能绝望地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例,或者事先协商好的欧洲内部汇率的威力,并逃避责任。此举在战术上的受益是明显的:但这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4〕 这个缩写单词有明显的政治用意:通过重新使用18世纪法国银币的名字以减轻法国人对西德成为参与欧洲事务的领袖角色的不满。

如果欧洲国家不能解决就业、高工资和经济增长的问题,其成员国必将觉得遭到背叛而变得非常愤怒。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政府领导人的本能反应是缓和蓝领工人阶级及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害最深,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有先例证明他们最有可能成为激发全社会范围的抗议。但是,事实证明,真正的反对者却不是他们。赋税沉重的中产阶级——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白领雇员、小商人和个体户——在重压和忧虑之下,迅速转化为对政府的反抗者。

毕竟,现代福利社会的最大受益者是中产阶级。当20世纪70年代的战后体系开始解体时,由于通货膨胀蔓延,由于以税收补贴衰退的工业,也由于因为预算和财政限制而减少甚至取消社会公共服务,他们觉得利益受到威胁,甚至感觉受骗上当。如同过去一样,对于现代福利国家的高税收而导致的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产阶级的感受最深刻。

中产阶级同时也被认为是最难“管理”的。20世纪70年代广泛流传着一种恐惧,那就是欧洲的民主党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首先,20世纪60年代破除旧习的革新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原先看起来是令人好奇的、甚至是兴奋的、充满信心的日子,现在却越来越像不稳定和无政府状态的预兆。接踵而来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带来了更多的焦虑,然而政府对此似乎无计可施。

欧洲政府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对时局的失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大众担心的根源——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在那些政治家身上可以发现他们坚持自己的缺点带来的好处。80年代中期,时任倒霉的英国工党政府财政大臣的丹尼斯·希利哀叹着充斥在欧洲大陆的数以亿计的存于欧洲非美国银行的美金,“那些不愿露面的人不断地将自由资金像原子云一样积聚到欧洲市场,以规避国家政府的管制”。〔5〕这正是他们的杰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罗德的政党正是因为对手——保守党成员——无力消除公众的不满,而在1974年成为执政党,但是在紧接下来的一年即被指责为无能。

在英国,甚至有些传言涉及民主机构应对现代危机的能力低下,涉及媒体对冷漠的局外人或非政治专家与“社团主义者”合并给政府带来利益的推测。在那些年里,英国一部分高级政治人物就像戴高乐(在1968年5月)一样,认为同警察和军队领导人会见是一条谨慎的措施,以确保一旦发生公众骚乱时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甚至在从来不怀疑议会制合法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低地国家,世界金融体系的混乱、战后经济明显的衰退以及传统选民的不满,都给战后容易自信的一代人带来困扰。

在这些模糊而活跃的疑虑和幻象背后,存在着非常真实而又在那时看来是一触即发

〔5〕 摘自哈罗德·詹姆斯《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国际货币合作》,纽约,牛津,1996年。

的危险。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国家的国内冲突并不多,公开的暴力事件也很少。在东欧、欧洲的殖民地地区、整个亚洲、非洲和南美地区,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流血事件。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期间,斗争和谋杀不断升级,从朝鲜到刚果有上百万的士兵和平民被杀。美国本土也发生了3次政治暗杀和不止一次的暴力流血事件。但是相比之下,西欧各国却平和安定。

欧洲警察也殴打和枪杀平民,但是通常只是针对外国人,所谓的深肤色的人。〔6〕除了偶尔与共产党的示威者发生冲突,西欧的军队很少被政府召集起来镇压暴力反抗,即便是有暴力事件,也是他们自己内部所为。按照两次大战之间数十年的标准衡量,欧洲的城市是相当安全的——这一点经常被评论员用来强调和对比欧洲社会的井然有序和美国城市疯狂而冷漠的个人主义。至于60年代的学生暴动者,对他们的评价是这样的:欧洲的青年人可能会参与革命,但大部分是出于展示或炫耀自我。“巷战者”的实际危害性很小。

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途突然一片黑暗。如同东欧在前苏联人入侵布拉格之后,在苏联政党领导人兄弟般友爱的拥抱下几乎窒息,西欧也逐步失去了对公共秩序的控制。挑战并不是来自传统的左翼。可以确定的是,苏联政府对这些年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优势非常高兴:水门事件和西贡“沦陷”决定性地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然而苏联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在中东危机中没有受到损害。但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出版英文版作品《古拉格群岛》而在1974年2月被强行驱逐出苏联,之后几年柬埔寨发生的大屠杀,以及所谓越南“船民”遭遇等等,都导致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彻底破灭。

除了一些非常边缘化的例子,右翼复兴的可能性也不大。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社会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选举的得票率从来不曾超过6.8%,它在任何场合都不关心自己是否表现得像一个合法政党。西德的民族主义者不太注重外部形象,而与比利时、法国或者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政党一样,他们在选举方面的重要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简而言之,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政党的代表,他们在西欧都没有前途。国内和平的真正威胁来自其他方面。

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社会面临两个严峻的考验。一个是病态的,源自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但是它以很现代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地区、在爱尔兰北部

〔6〕 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发生在1961年10月17日,法国警察谋杀了大约200名阿尔及利亚人,还有许多人是在巴黎跟随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塞纳河时淹死的。当时的警察局长是莫里斯·帕彭(Maurice Papon),他后来因战时与德国纳粹合作、逮捕在法国的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而被指控犯有侵犯人权罪。